

《三国演义》作者及版本问题研究述评

□张志和

《三国演义》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它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出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了解这部小说的形成与演变，了解其作者问题与版本源流，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我国的小说发展史乃至我国古代的俗文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数十年来，学界对于该书的研究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里就近 70 年来学术界对《三国演义》的作者与版本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一些梳理。

一

《三国演义》一书，明清两代刻本极多，然那时真正探究其成书与版本的人却没有。上个世纪 30 年代初，鲁迅先生作《中国小说史略》，谈到《三国演义》的版本时说：“罗贯中本《三国志演义》，今得见者以弘治甲寅（1494 年）为最古。”（《中国小说史略》之《元明传来之讲史（上）》）但未作详述。

真正对这一问题作较详细具体叙述的，当首推郑振铎先生。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其它明清刊本的发现，世人方才知《三国演义》一书，除了毛宗岗本之外，尚有这么多版本存在，至此才有了探究该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版本流变诸问题的条件。郑振铎先生遂作《〈三国演义〉的演化》（《小说月报》二十卷 10 号）和《罗贯中及其著作》（《青年界》一卷一期，1931 年 3 月）诸文。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郑振铎先生据当时新发现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题署及该书中蒋大器所作的序，定为“东原罗贯中”；而关于罗贯中的生平，因为他当时尚没有见到明初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只是作了种种推测，认为“大约他

生于元，而卒于明洪武间的假定，是比较可信的”。

关于罗氏作此书的情况，郑振铎先生认为：“罗氏生当杂剧全盛的末期，自知不足以胜人，便于《斲虎风云会》之外，搁笔不再作，而独写小说于举世不为之日。”郑振铎先生是严谨的学者，自以为此论无所依据，故而又说：“这些话都还不过是悬想。”至于版本问题，他以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被后人修改最少的一部。毛宗岗的《第一才子书》，虽标明他自己伪造的古本，用来删润罗氏的原本，然所改削的地方，究竟不多，罗氏原本的面目依然存在。近来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发现，不止一本，其面目大都无甚异同，可证其为罗氏原本无疑。”（《罗贯中及其著作》）他的这一结论，后来又直接写进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

胡适先生 30 年代也曾对这一问题发表过看法。他在《三国志演义序》中说：“《三国志演义》不是一个人作的，乃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旧说都以为《三国志演义》是元末明初一个杭州人罗贯中作的……大概他是当时的一个演义家，曾做了一些演义体的小说。明初的《三国演义》也许真是他作的。但那个本子和现行的《三国演义》不同。”他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修改者、最后写定者，都是平凡的陋儒，不是有天才的文学家，也不是高超的思想家。”（《三国志演义序》载《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胡适先生的看法是不同于郑振铎先生和鲁迅先生的。也许是缺乏详密论证或其它原因，他的观点并未被后来的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几十年来，由郑振铎先生所确定的“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原本”这一

说法几成定论,为后来的大多数论者所遵从。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学界曾一度形成了一个讨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热潮,有不少论文发表,并出版了董每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试论》,孙昌熙的《怎样阅读〈三国志通俗演义〉》和鲁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论集》三本专著,但这一时期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作者和版本源流的研究却没有多少进展。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在其出版说明中,又进一步加固了郑振铎先生的观点,不仅定此书为罗贯中作,并据该书卷首庸愚子蒋大器的序文推测说:“嘉靖本可能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刻本”。且又据该书小字注中的地名,推定该书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元末明初”。人文社的《出版说明》并没有超出郑振铎先生的思路,但从该书地名注考证其成书时间,也算是一个新角度,姑且不论其能否澄清问题。

与此同时,海外学人也在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探讨。1976年,寓居澳洲的柳存仁先生撰成《罗贯中讲史小说的真伪性质》一文,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万历以后诸刻本《三国志传》的关系,先从诸本标名、署题及版刻情况等方面作了分析,又以今藏于英国博物院的乔山堂梓行《新授全像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与普通坊本毛宗岗评《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及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文字方面的对勘,得出结论,认为“《三国志传》之古朴,似仍可代表罗贯中生存时期说部之文字风格”。而“此类《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易言之,则目前为吾人所见之数种《三国志传》其所保存《三国》小说之旧有形象,实当更在嘉靖本以前无疑。”(详看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柳氏是对版本考据极有功力的学者,所以他的这番考校所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大抵是因为彼时国门尚未打开,他对于国内所藏《三国志通俗演义》诸版本,未能亲见,故对这一问题未能作出更具体确切的结论。

也可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执教于复旦大学的章培恒、马美信两位先生1980年为上海古籍出版

社以嘉靖本为底本排印出版《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前言》时,尚不知道柳氏已有此高见,仍是循着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该书时作的《出版说明》的思路,从地名注入手来作考证,更为确定地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定为元人罗贯中之原作,并将其成书时间定在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

此说一出,马上又有人提出疑问,1983年,王长友同志撰文质疑: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倘若不是,那么又怎能以这些小字注为根据考定其版本与成书时间呢?他列举了六个方面的材料来证明小字注非作者所加,认为“这些注文恰恰证明作注远在小说刊行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兼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和成书时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2期)

争论既起,章培恒先生为确证己说不诬,遂于1985年作《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的作者》(《复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针对工文作答。山东大学的袁世硕先生更明确地指出,“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作”。(见《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

因诸家所论多是就嘉靖本论嘉靖本,而不涉及其它版本的具体内容,加之嘉靖本中的小字证实少确证可依,所以彼此的立论大都只能建立在思辨的前提之下,是者自是,非者自非,未能获致统一的认识。

又,湖北大学的张国光先生亦撰文,论及嘉靖本小字注的作者、成书时间及该书作者等。他认为小字注“是该书作者抄录旧籍时随手所加”,其成书时间当在明中叶。(《嘉靖本成书于明中叶》,载《三国志通俗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后来他又进一步强调“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此外,还有人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元代作品(参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研究集》所收刘友竹等人的文章)。甚至有人说该书是宋代的作品。这些论述均因证据不足,故信从者不多。

关于版本问题,还有如周兆新先生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考评》,麦莱莲的《朝讲唱文学和早期中国小说的关系》、《词话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演化》,上田望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版本试论》,金京文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版本试探》等,都得出了与柳存仁相近的看法,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本有可能

探索与争鸣

早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存在,但在这些考证中,虽然列举了大量具体确凿可靠的证据,却都因为没有找到早于嘉靖本的更早的版本来证明其观点,且在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个问题上,大都仍退守到郑振铎先生以来的传统观点上,致使对于《三国演义》的考证似乎已接近于突破固有观念的临界点,却不免功亏一篑。

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学人是英国的学者魏安先生,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学位论文即《追求其原文:〈三国演义〉的考证学》,这篇博士学位论文1993年完成,后经补充,更名为《三国演义版本考》,于199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该书可以看出,他共罗列了现存《三国演义》的35个版本(不包括某个版本的重刊本)。在调查《三国演义》版本的过程中,魏安遍访欧、美、日、中各大图书馆,共考察了26种不同的非毛评本的版本。这应当说是相当全面的。更为值得重视的是他的研究方法,作者声称,他为了避免主观臆断,而采用“新的比较版本研究方法,根据流传过程中发生的传抄错误,科学地、客观地把众多版本分类,并且断定各版本之间的来源关系,从而探讨《三国演义》的演化历史”。具体地说,他采取了查找各版本在相互传抄的过程中由于抄写错误而出现的“串句脱文”的方法,他假设在一本书的流传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很特殊的抄写错误,就是如果在几行之内两次出现相同的(或略同的)词(或词组),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现的词(或词组),然后在原文上看错地方继续抄下去,结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脱漏一段文字。应当说这种方法,对于调查版本源流也是相当科学和合理的。

如果单从上述两点来看,很容易让人相信,魏安对于《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的考察所作出的结论是可靠而且正确的。事实上则不然,因为他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其一是出发点错误。他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就已把《三国演义》确定为罗贯中的个人创作,去“追求其原文”,而忽视了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作为俗文学实际上是由自宋元以来的民间艺人通过说唱艺术“世代累积”而成的(下文详述)这一点。其二是,他采取调查各本中“串句脱文”的情况来确定版本源流的方法,客观上看虽有科学性、合理性,但也许是因为魏安作为异国学人对中国文化的

理解和把握尚不够准确,所以在他所罗列的许多“串句脱文”的对勘例证中,有不少并非“串句脱文”,而是行文繁简的不同。由此失误,他的关于《三国演义》版本源流的分类排列,其可靠性就难免要打折扣了。或者说,他关于该书版本的考证,方法正确,而结论并不完全正确。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行撰文,详论其得失。

70余年来,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作者问题和版本源流的讨论情况,概略如此。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看清此一问题形成传统看法的依据,亦可见各家所论得失之所在。今天,如果我们不抱成见来审视这一问题,那么应当说,郑振铎先生以来的传统观点,自有其不可信的成分在。而新的观点之所以不能为学界所信从,亦在于或缺乏充分的证据,或考证的方法欠妥当。这一问题之所以未能澄清,俱在于未能对相关的材料作全面把握与仔细考辨。但也不能不看到,数十年来学人的努力,问题虽未澄清,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时至今日,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作者及版本问题,似有可能作出一个较为确切的论断了。

四

澄清《三国演义》版本源流问题的最大难度,在于大多数关注这一问题的学人在客观上缺乏精力和时间来对该书现存的众多版本作具体深入调查。从上述情况看,自郑振铎先生以来,真正在这一问题上下工夫的学者,不过寥寥数人而已。这使得关乎《三国演义》研究的根本的问题,成了整个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致使这个事关小说史乃至文学史的大问题,仍然不能得到澄清,现有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中,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将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定为该书的最早刻本,并将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定为该书的作者,而对这一说法所存在的明显疑问不管不顾,如罗贯中生当元末明初,在他之前,我国尚没有长篇小说出现,也没有成熟的小说理论作支持,他是怎样的天才,凭什么来创造这样一部不朽的杰作?退一步讲,假如他真的创作了这样一部杰作,这部书一直到他去世后近200年(如章培恒先生所说的该书在1329年以前已经完成,而现在所公认的早最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在1522年刊刻的)才刊刻问世,这200年间它是怎样保存下来的?诸如此类

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吗?

笔者于1985年开始关注有关《三国演义》的学术研究问题,199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启功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时,遂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三国演义研究》,目的是想利用国内所藏明清时期的《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大多数都在北京这样一个有利条件,从文献学的角度来一次规范操作,作尽量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系统的考证。至于流逸国外的版本,则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或有关介绍资料,并参看近年来从国外复制回来的缩微胶卷等进行研究。此后,笔者着重对目前在国内所能见的13种版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而初步调查已经显示出柳存仁、周兆新等学人所说的《三国志传》系统的版本虽多在明万历以后出现,其所依据的祖本要比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早得多这个观点是符合事实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找不到早于嘉靖本的版本,这一结论将很难被认可,旧说也就难以被动摇,关于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种种疑虑,也就难以澄清。

为此,笔者试图通过更为具体详尽的调查考证,找到早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所幸这样的版本还真在国家图书馆保存着,这就是明书林黄正甫刊《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这是一个比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早约20年以上的原刻于福建的坊本。明天启三年重印时,原书的封面、序及目录均已丢失,书坊乃据其它版本补配重印,而正文部分实是旧板。正因为这一点,许多研究者都将其视为晚明刻本而未加重视。为此,笔者通读详校了这部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并将其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及其它各种版本作了对勘,获得了大量证据,证明它不仅比嘉靖本早,而且比其它《志传》本都要早。这个版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接近于该书的最早刻本的版

本,甚至可以说,这个版本就是《三国演义》一书最初整理写定的本了。就这一考察所得,笔者撰写了10多篇拙文,先后发表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及其它学术刊物上,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今所知的《三国演义》明清时期的刊本有30多种,大体上可分为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的《演义》本系统和以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为代表的志传本系统。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出现,且黄正甫刊本上没有署作者的姓名,从语言风格上看,该本中有“王”、“皇”、“黄”不分以及“蚩”、“颀”通用的例子(该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感兴趣的读者自然可以从中看出端倪),这是一种很原始的风貌,而后来出现的各种版本,在这些方面都已经做了修改。可以看出其最初写定者是南方人,而不可能是太原人罗贯中。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在对早于它的版本进行整理加工的基础上由官方(司礼监)刊行的,它将生活在200年前的太原人罗贯中的名字拿来当该书的作者,是一附会,并没有根据。

由此,我们似可澄清这样一点,罗贯中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三国演义》的成书,当如胡适所说,是自北宋至明中叶的“五百年间的演义家”共同创作出来的“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其最初写定者是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下层文人。可以推想,他最初是对说书艺人讲说的三国故事作“耳录”,然后再参照《资治通鉴》、《三国志》等书对其作“按鉴考订”,整理成书。以后出现的各种版本,都是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再作整理加工而成。澄清了这一点,实有助于我们打破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这个神话,有助于我们认识该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更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作为俗文学的小说发展史。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 萧瑜

责任校对 萧瑜

启 事

本刊还有少量1992—1996年合订本,每本50元,1997年合订本,每本60元,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合订本,每本70元。如需要,请向本刊购买。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35号7层

邮编:100080 电话:(010)62514709 62514710